

热点评论 | RedianPinglun

中国制造业切莫沦为脆弱的“北洋舰队”

特约评论员 韦桂华

如今，中国制造业长期赖以生存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缺乏创新的模仿与抄袭，缺乏理性的投机与暴利，缺乏敬畏的失信与失德，缺乏前瞻的盲动与盲从，使“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中国制造业迅速滑向“空心化”，终于走进萧条的秋天，进入一个“苦难时期”。

事实上，制造业的空心化已经开始动摇中国的制造大国地位。2004年，笔者研究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新疆德隆，在《一个人的企业——探寻颠覆德隆的标杆意义》中指出，“没有创造，战略成为空想；没有创造，资本只能空转；没有创造，产业必然空心。战略空想、资本空转、产业空心，绝非德隆独有，在一定程度上已发展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普遍现象。”

2010年，笔者研究黄光裕与陈晓的博弈，在《国美之战——公司股东博弈的中国启示》后记中，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众多的温州人以中国的犹太人自诩，或许潮洲人才是真正的东方犹太人。深入的接触发现，浙商骨子里缺少犹太人的品质与品位。犹太人的生意智慧中可以销售一切，但不销售灵魂；浙商的生意智慧中，不仅销售产品，也销售灵魂。把灵魂卖给国际化，世界谁不怕？”

今年6月份，在《温州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敢丢弃的名片？》一文中，再次提出

“三空问题”——“战略空想、产业空心、资本空转是温州危机的关键所在，民间融资只是压倒温州企业主的最后一根稻草，而非全部。”“实业沦陷、精神沦陷、道德沦陷甚至还包括管理沦陷，这才是当今温州面临的真正‘困局’，而走向颓废、沦落的温州，是无法代表中国民营经济未来前进方向的，更无力肩负引领民营企业在新时空、新起点上实现新跃变！”

长期的企业生涯使笔者深知，权力寻租、政策无常、利益集团操纵，使中国经济发展空间飘荡着大量不健康因子，助推了社会大众的急躁、浮躁，经营者贪婪本性的膨胀以及道德底线的失守，加之国家垄断资本变幻莫测的“吸金大法”，实业经济的体质变得臃肿而虚弱，甚至一些地区、一些经营者完全弃守实业经济。长此以往，中国制造业完全有可能渐渐沦为为150年前“洋务运动”下的“北洋舰队”，在欧美列强的“核心创新力”面前几乎不堪一击。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的8月份中国制造业PMI为49.2%，比上月下降0.9个百分点，继2011年11月49.0%后再度跌破50%荣枯线。从企业规模看，8月份中国大型、中型企业、小型企业PMI分别为49.1%、49.9%、47.7%，均低于50%，表明制造业整体下行趋势不断加剧，特别是钢铁、原材料加工等下行明显。

钢铁业，8月份PMI为39.9%，比7月份回落4.6个百分点，创2008年12月份以来的新低。钢铁企业上市公司中报更是惨不忍睹。马钢巨亏近19亿，山东钢铁亏损9.96亿，杭钢股份亏损1.07亿，沙钢、八一钢铁和太钢等净利率降幅超过五成。行业利润降至冰点，钢铁业每吨钢仅赚1.68



元，进入市场面临崩盘的极度深寒时期。

在温州、鄂尔多斯、东莞等地，制造企业基本凋零；号称“制造业之都”的深圳，经济指标出现大面积负增长……

资本逐利本性导致大量资本从微利实体经济流出，进入房地产、新兴产业等暴利行业，加速了这些产业的泡沫化，企业负债率更高得惊人，以致形成民企老本“跑路潮”。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8月3日在宁波举行的中国银行家论坛暨2012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报告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企业的负债率是世界国家中最高，经济合作组织企业的负债如果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0%就危险了，而据统计2011年中国的企业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是107%。

9月1日，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2012中国500强发展报告》，入围500强的14家商业银行共实现营业收入3.25万亿元，较上年增长30.32%。其中，中国最大的5家商业银行营业收入占500强企业营业总收入5.7%，但其利润却占到32.2%；与此同时，与之相对应的272家制造业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虽占500强的42.7%，但利润却仅占25.04%。这也是5年来，5家商业银行500强利润比例收入超过制造业，也是制造业利润占比降幅最大的一次。

实业经济与商业银行之间的悬殊利

润，必然诱导资本流出实体经济、流向金融部门，制造业将会更加虚弱。而中国制造业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在盈利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商业模式创新、引领产业发展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喊了许多年，结果是“制造业空心化”了。

与此同时，陶氏化学、卡特彼勒、大众和福特等公司已决定将部分生产部门迁回美国本土；阿迪达斯、耐克等将加工基地向东南亚搬迁；在中国青岛的14家韩国宝石、饰品企业将返回韩国全罗北道益山市某产业园区……

2011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某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公司讲话时表示“美国得重返制造业”，向世界传递一个重要信息——要让制造业成为美国经济持久发展的重要支点。6月份，奥巴马提出大力发展先进信息、生物和纳米等技术的小型高性能电池、先进复合材料、金属加工、生物制造的替代工程等先进产品，以及智慧产业，以此来拉动美国制造业复苏。2012年美国制造业开始出现强劲的复苏，曾经转移海外的就业岗位现在已经回流到包括汽车业在内的产业领域，甚至回到不大可能出现的家具和电视行业。

Gluskin Sheff首席经济学家罗森博格(Dave Rosenberg)指出，美国制造业“在多年的谷底之后”终于确实地再度兴起了。“现在很多时候，在本地生产商品都要比在海外生产更为合算。”

全球制造业的再分配已经开始，未来全球在实体领域的竞争将日趋激烈。中国制造业虽然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但中国制造的劣势正在不断削弱。我们必须慎重对待制造业空心化、外资企业撤离、实体经济环境等现实问题，加速推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真正以科技创新引领和支撑产业发展。否则，“中国制造”极有可能沦为“洋务运动”中的“北洋舰队”，全无战斗力与竞争力，那就是我们的奇耻大辱了！

杭州“土地新政”潜伏的五个问题

张宏伟

观点地产网10月17日消息，杭州市国土局日前下发通知明确，当商品住宅地块溢价率达到49%时，将调整竞价方式，即锁定地价，“从零开始”竞投配建安置用房或保障性住房面积，最终配建保障房量多者得地(简称杭州“土地新政”)。

据悉，这一通知是在近日的一场杭州拍卖会上，杭州市国土局下发给参与当日土地竞拍企业的。

杭州“土地新政”有何影响？能否起到遏制土地价格过快上涨的作用，其他城市会否效仿这样的做法，对此，笔者提出以下五点思考与看法。具体而言为：

首先，杭州的“土地新政”应该不是所有地块都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成交的，政府也没有公开发文要全部按照这个执行，只是在招拍挂前给参与的开发企业的限定，应该来说是一个尝试，还是只是个别地块的成交方式。

其次，在市场“基本面”尚未完全回暖的市场背景下，如果没有人为地降低起拍价格，土地市场溢价率应该还不会普遍达到49%这样的水平，因此，这样的条件下实际发生的地块成交案例并不会太多。

因此，当商品住宅地块溢价率还没有达到49%时，是不是就意味着就没有配建保障房的指标了？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另外，当地块溢价率达到49%及以上时，保障房的配建本身在地块规划上是否合理，开发企业最终是否按此执行，都会有些问题在里面。

此外，对于市中心优质地块，大型开发企业势必会争抢，如果地块溢价率达到49%及以上时，配建的豪宅保

障房归谁去住？这些问题还真的值得我们思考。

第三，杭州“土地新政”尽管可以控制总的溢价率，甚至还可以配建一部分保障房，尽管可以起到防止土地价格过快上涨的作用，甚至可以控制溢价过高的“地王”的诞生，但是，这不是最根本有效的办法。

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尤其是市中心优质地块的推出势必会导致高溢价率现象产生。通过多渠道持续增加土地供应，同时，保证一个稳定的市场预期是稳定土地市场的最关键之处，而不是哪里疼医哪里。

第四，当前市场基本尚未完全回暖的市场背景下，溢价率49%的最高限制有可能会暗示一部分开发企业，尤其是高周转及央企品牌开发企业，在不超过溢价率49%底线的情况下进一步疯狂抢地，一方面使市中心的优质地块及比较好的地块资源向这些大型房企手中集中，另外，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行为也会助推土地市场价格走高。

第五，至于效仿与否，杭州“土地新政”短期内倒是控制土地市场价格过快上涨的一个方法，尽管还有些负面效应，但是，对于一些热点区域及热点地块的话，采用这样的方式应该可以控制短期内的土地市场溢价率，起到一定的作用，短期内可以效仿进行操作。但是，杭州“土地新政”总体来讲比较难达到中长期控制土地市场价格上涨的预期效果。原因很简单，土地本身的价值就是值那么多，以人为的方式控制溢价率，而不是市场化的方式去解决土地资源问题，这只能导致土地市场价格一旦没有这样的溢价限制，就会出现报复性反弹。

何享健为啥不怕方洪波“变”陈晓

丁是钉

同样是家电圈中的巨头，一年前，黄光裕费尽周折把“叛将”陈晓赶出了国美电器；一年后，何享健顺理成章让“爱将”方洪波接掌美的集团。

尽管黄光裕最后还是用资本的力量保住了黄氏家族对国美的控制权，但是，陈晓联合二股东、策反经理人，试图弱化创始股东地位的行为还让许多家族企业对使用经理人增加了一份犹疑和防备。

那么，年届70的何享健为什么可以放心地把年营业收入1400亿的美的集团交给经理人打理，他就不担心方洪波会变成下一个陈晓吗？

从人性的层面来看，20年合作建立起的信任是何享健选择方洪波最直接的情感因素。这其中人格信任是基础；能力信任是核心；文化信任是要害。因为只有相信美的的企业文化和企业战略能够得到传承和发扬，而不是会遭到破坏和改变，何享健才会真正放心地把对美的的掌控权交给职业经理人。

从制度的层面来看，从10年前何享健就开始为交接班做铺垫，美的在治理结构设计、授权与激励体系建设、职业经理人团队打造等方面具备了体系化的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何享健一直保留着在资本上的绝对控制权。美的电器2012年半年报显示，何氏家族掌控的美的控股握有美的集团59.85%的股份。在由10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中，何享健之子何剑锋和美的控股总裁梁建伟代表大股东，陈劲松、胡晓玲分别代表战略投资者融睿投资、鼎晖投资；其余董事均是在上世纪90年代就加入美的，可谓是美的长期以来培养的嫡系经理人团队。方洪波在董事会中只有1/10的表决权。在这样一种治理构架下，只有方洪波的意见与大股东的意志一致时，其才拥有决定权；如果其意见与大股东的意志相悖时，其只拥有执行权。也就是说，方洪波根本不拥有另立山头或策反董事会的权力或能力。

事实上，当初陈晓之所以能够公然和大股东进行对抗，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创始股东目前虽持有公司35%的股权，但在董事局却没有任何代表权，这与贝恩享有上述权利(拥有3个董事会席位)的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黄光裕语)。何享健通过对股权结构的安排，以及向董事会派出能够完全代表其意志的董事，从根本上解决了权力有可能被架空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世袭式的传承制度和企业文化，给现代中国家庭企业的“交班”带来了很深的文化暗示和影响；在现实中，国美等企业在由家族传承向职业经理人管理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和失败，更是让许多家族企业对于把“帅印”交给职业经理人心有余悸。美的通过规范科学的制度设计，建立了大股东既参与决策，又受到战略投资股东、职业经理人的制衡的现代治理结构，为最终实现美的集团以及何氏家庭利益最大化提供了保证。

当前，中国已经到了“创一代”家庭企业交班的高峰期，尤其是在大部分家族下一代成员不愿意接班的大背景下，美的集团的“何式交班”模式为家庭企业的传承及科学治理提供了具有高度复制性的范本和案例。

